

钟敬文与彭湃改造农民文化的两条道路

董晓萍

(北京师范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5)

〔摘要〕 钟敬文与彭湃是好友。彭湃是典型的农民社会主义革命家; 钟敬文是闯入农民精神世界的典型学者, 并第一个建立了关于它的中国民俗学体系和教育模式, 使之有助于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稳固基石。从中国现代社会变革的实践看, 两者都不可或缺, 研究两人的选择是不无价值的工作。

〔关键词〕 钟敬文; 彭湃; 农民; 民俗学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03) 02-0087-04

著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革命家、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和被国际学界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的钟敬文均为广东海丰籍人士。他们都曾在席卷家乡的“五四”反帝示威斗争中, 书写过少年壮士的激情; 又都曾在东渡日本的岁月里, 留下了追求真理的足迹。他们还曾多次相倾谈、相勸勉, 选择了热血人生和报国之路。

彭湃在 1926 年出版的第 9 期《中国农民》杂志上, 刊登了一篇名为《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的文章, 第 6 部分“实际的农民问题研究”讲到: 为了帮助学员了解农村社会, 农讲所成立了 13 个农民问题研究会, 对 36 个项目进行了调查, 由学员写出调查报告, 内容包括“民歌”、“成语”、“宗教之信仰状况”等项。这说明在我国社会主义萌芽的早期, 包括民歌在内的民间文学和相关民俗的调查搜集, 就已被当做一种文化因素, 用来设计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当然, 那时社会主义革命家调查民间文学和民俗的直接目的, 是要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历史状况、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出切合实际的分析, 以指导农村革命实践。彭湃在农讲所讲授了“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的课程, 还把家乡海丰

县列为他的革命实验田和教学基地, 亲自带领学员去做实地考察。

在海丰, 与彭湃齐名者是钟敬文。当 1926 年彭湃在广州农讲所出刊《中国农民》杂志时, 钟敬文已是北京大学歌谣学运动中一员骁将, 在岭南大学为农民艺术而讴歌, 与友人出版了新诗集《三朵花》、创办了《倾盖周刊》, 后又编译了第一部两广多民族情歌集《粤风》、发表了一批研究民间文学的文章, 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帅之一胡适的瞩目。

如果说彭湃是典型的农民社会主义革命家, 钟敬文则是闯入农民精神世界的典型学者。他无怨无悔地一生留居在那里, 长达近 80 年, 并第一个创建了关于它的理论体系、教育模式和中国学派。他的个人经历是充满了爱国激情、民族意识与农民关怀情结的书斋生涯。

钟敬文与彭湃都是中国现代社会思想文化改革中公认的重要人物, 都成就了扶助农民事业的大业。不同的是, 钟敬文所选择的学术道路, 是从文化上接近农民、解释农民和教育农民, 目的是使这一劳动阶层成为新民族国家的稳固基石。它没有沙场上的刀光剑影和政治上的短痛, 却有

〔收稿日期〕 2002-06-02

〔作者简介〕 董晓萍 (1950 -), 女, 辽宁大连人, 文学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开辟上的艰难坎坷和文化上的长痛，乃至同样要付出几近生命的代价。但事实证明，它也是一条必由之路。两条路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五四运动所孕育的中国知识界的产物。

用历史眼光看，五四运动在对待农民文化问题上，实际是存在着两种假设的：一种是中国已存在着一个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劳动人民群众，一种是这个群体的文化无意识论。从当时的革命目标看，这两种假设是合乎逻辑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赋予了乡村农民一种民族希望之光的地位，还确定了他的文化标志就是民间文学。那么五四运动要冲击封建贵族文化，扭转被压抑的下层文化的地位，就要歌唱其民间文学。而由于从前农民没有受学校教育的权利，不知道自己的口传之物是民间文学，所以需要知识分子下乡去告诉他们。在这批告诉他们的知识分子中，就包括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大批青年志愿者。他们的下乡之举，在现代史上称“到民间去”。从政治上说，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前奏；从文化上说，是构建农民作为一个阶级的阶级意识。

在上述两种假设中又隐含着悖论：既然认为农民文化无意识，就等于否认了农民原有自觉的文化创造，而农民连自己创造了“民间文学”这件事都不知道，那么“民间文学”的概念便是知识分子送给他们的，知识分子不去搜集就没有，至于“民俗”的概念也如此。而没有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概念的共享意识的地方，也就没有知识分子理想中的“农民”，所以连理想的“农民阶级”的概念其实也是虚构的。

在“五四”以后的二三十年里，不少知识分子不断地搜集民间文学和改造民间文学，正是因为他们所设计的民间文学概念与在农民的生活中看到的口传文学有距离，连“农民”群体本身也不大符合他们理想中的“农民阶级”的标准，所以需要改造，使之成为无产阶级的补充部队。总之，他们最初提出的农民及其民间文学先天优越的说法，已被打了折扣。而社会主义革命者在这方面的革命作为，便是按照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理念改造传统的民间文学和它们的承载者——农民，让农民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主人翁。

钟敬文之治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特点，是从农民固有文化的角度，研究它的社会意义和文

化价值，而限于从外部拿它当革命工具。这一认识，在当时也有思想基础。它颇体现了从晚清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学术思潮的变化。当时在日本，在欧洲的英、德、法、俄和芬兰等国家，诞生了研究民众文化的专门学问——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许多国家同时还在兴起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运动。钟敬文的早期选择与此有关。

当然，他的思想原动力和学问根底不是外来的，而是本土的。他主要是受到了彭湃等社会主义革命家和蔡元培、刘复、周作人、顾颉刚等北大学者的双重影响，他把它视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远影响。从此他既选择了乡村农民做主要的民众对象，又选择了文化的视角。因此，他一直说自己是“五四的儿子”。

从钟敬文的治学内容看，他所创设的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都是研究农民素质文化的最基本、最深刻的大学问。由于这一领域缺乏现代科学研究的基础，其建设过程是相当艰苦、寂寞和漫长的。他孜孜以求、锲而不舍、仆仆道途、风雨无阻，坚韧地在这个为中国绝大多数人口所拥有、却为现代知识分子所隔膜的文化王国里长途跋涉，终成正果。

中国是一个文学大国，从前的文史哲与自然科学知识大都被包裹在历代美文华章中。“五四”的一个革命结果，就是通过对民族历史的重塑，或说历史化的过程，把各个门类的知识剥离开来，撰写各自的历史，以确立本民族悠久丰厚的、匹敌于世界其他古老和先进文明民族的文化遗产。这本身就是现代学科发轫的标志，在这一过程中，诞生了现代民间文学和民俗学。

但不久钟敬文发现，人文文化现象不是都能被历史化的。拿民间文学来说，考察它的每一种事象都有独立的现实意义。在中国，如果农民可以成为民众的主体，那么他的整个文化便都应具备这种性质。

钟敬文说：“它是具体的、是活动的、是复杂的。它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形，同时又在旷远的时间空间等上面保持着一种关联的线索。”因而要从现实的功能上去考量和接受这种文化。他说，某些人不了解这种情况，以为农民文化“是一种很简单的东西。它不值得费较大的力量去注意。其实，这只表明了他们脑子的‘简单’而已。事实正位于他们所幻想的东西的对面”。他

还提出, 农民文化有自己的发生特点, 有自己的渊源, 有自己的高峰, 有自己的衰落, 它的生存能力之强大之稳固, 恐怕没有哪种上层文化能比拟。他还预言: “人间恐怕没有比这更深更大的学问了!”^[1]

1935年, 他首次提出创设民间文艺学, 提出民间文学具有独立的范围、群体的共享意识和特殊的性质, 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此时他进一步提出: “民间文艺学和文人文艺的机能, 有很不同的地方。例如民间的韵语, 大多直接地被应用于辅助劳动、医治疾病、咒诅自然、结合婚姻等方面 (能否都发生确实的效果, 是另外的问题); 而神话传说, 也往往被用以作为决定政治、解释疑惑、保证安宁的工具。” “这种过程, 和文人文艺所经历的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他还说, 正是这种民间文学, 能作为 “某地域的某集团大部分人思想和情感的共同表现”。^[2]

这时钟敬文已接受了欧美文化人类学派的影响, 编制了民间故事类型 (1929 ~ 1931), 开始探索民间文学本身的口传形态和传播形式。但年轻的钟敬文并不盲从西方进化论的宣传。他最早建立的民间故事类型是十分东方化的、中国式的, 这引起了德国和日本学者的注意。他们中间有些学者模仿他的思路, 发展这项研究, 撰写了适合亚太地区文化的故事类型, 一日成名。钟敬文本人则进一步探索民间故事中的超文学现象, 终于说明, 这种现象流传的原因在于它所依赖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

早在 1931 年, 他已撰文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那时他对中国古籍上记载的农村斗牛故事发生了兴趣, 做了仔细的研究, 看到了中西民众文化存在的差异, 坚定了从本土文化出发做本土实证研究的思路。他说: “我以为西班牙式的斗牛, 与中国式的斗牛, 是产生于两种不同的经济背景之下。前者是狩猎时代的产物, 后者是农耕时代 (或兼畜牧时代) 的产物。”^[3]

钟敬文的民间文艺学观, 一是区别于中国正统文学的, 一是区别于当时独霸天下的西方民间故事学的, 而这两个区别, 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

自 1936 年起, 钟敬文转向民俗学。他明确提出, 民俗学是一门对民间文艺学、文化学、民族学、法律学、宗教学、艺术学和文艺学等都有

着 “不容蔑视的贡献” 的重要学科, 能直接承担起教育农民的职责。^[4] 从这时起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 他一直坚持把 “增强农民的文化史知识和民族意识与感情” 当做 “中国民俗学的宗旨和目的”。^[5] 这能证明他的早熟的思想 and 探究的夙愿 60 年不变。

钟敬文毕生致力于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大构架, 正是建构一种国民素质文化的总体学问。目前, 民俗学在我国已成为一门比较兴盛的人文学科, 在农村文化建设中日益发挥了它的显著作用, 这也说明了农民群众对它的认可。

钟敬文的民俗学思想体系, 历时半个多世纪的磨砺和积累, 包含了丰富的学术创见与国情体验。这两点, 对建立中国农民素质文化的学问都是必不可少的。

从学术创见来说, 他是把口头文学当做认识农民的基本资料, 结合历史文献, 做综合考察。从 20 世纪 40 年代起, 他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现在, 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做指导, 将物质基础和社会组织作为民俗文化事象的客体, 研究在客观的自然界与社会史发展中, 主要是在近、现代中国农民生活史中, 所出现的物种起源意识、农耕神话意识、家庭平等意识、反帝反侵略意识、反封建意识、妇女解放意识、民族觉醒意识和一国多民族文化认同意识等。他同时强调实证研究, 认为在具体专业方法上, 可以吸收国外先进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说, 但目的是发展本土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他提出, 所有的口头文学, 如民间故事、史诗、歌谣、谚语和谜语等类型化的东西, 没有系统的民俗志资料都无法做出准确、深入的解释, 而民间文学类型化的东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动员自己的研究生下乡去做田野作业, 搜集民俗志资料 and 发现其被民众使用的功能, 以便准确地描写这种文化。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末, 钟敬文对他的民俗文化学说体系又做了进一步的思考, 出版了《民俗文化学: 梗概与兴起》(1996) 和《建立中国民俗学派》(1999) 等新著。

从国情体验来说, 钟敬文把治学经验 (包括个人坎坷经历的体验) 当做一种对社会历史变革的严峻性的认识过程, 或者对学者献身民众文化

事业的学术历练，或者一门新学问被文化大国接受的“通过仪式”，仁忍而无悔。这在钟敬文也是一种日常处事原则，而坚守这一原则对他来说是非常有效的。这样他所从事的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研究就都变成了可以细致规划的工作，如日常教学、组织编书、发动搜集民间文学和民俗资料的群众活动、建设学术机构、开会、出访和参加各种兼职社会工作等。他诸务缠身而不烦忧。

钟敬文所从事的上述文化建设工作，都是在“五四”精神的照耀下完成的，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这与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社会主义江山和中国人民幸福生活的壮举，是一样的崇高，一样的令人敬佩。他本人也曾把两者相比较说：“我每次走过天安门，看到那矗立

的烈士纪念碑，就想到正是那些数不清的无名英雄，用了他们的热血头颅换来了我们现在这个庄严地矗立于东亚大陆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换来了我们10亿人能够安居乐业，并且进一步创造人类文明、新制度的大好条件！任何人都不能忘记这个金石不烂的历史事实！我们今天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继续进行先烈们未竟的伟大事业。我们的处境虽然远比他们好，但任务却一样地严峻。我们正该以加倍的奋力去完成这种任务！”^[6]

钟老经常缅怀彭湃，但也正如他所客观分析的，两者都不可缺。彭湃等社会主义革命家所梦想达到的，不也正是这种中华文明的真正振兴吗？他们才是农民神话中所传诵的那种“文化英雄”，我们的民族还需要更多的他们。

〔参考文献〕

- 〔1〕钟敬文. 引言 [J]. 民众教育·民间风俗文化专号, 1937, 第5卷 (9, 10).
- 〔2〕钟敬文. 民间文艺学的建设 [J]. 艺风, 1936, 第4卷 (1).
- 〔3〕钟敬文. 金华斗牛的风格 [J]. 开展月刊, 1931, (10, 11).
- 〔4〕钟敬文. 民众生活模式和民众教育 [J]. 民众教育·民间风俗文化专号, 1937, 第5卷 (9, 10).
- 〔5〕钟敬文. 建立中国民俗学派 [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 〔6〕钟敬文. 生命的价值 [A]. 新的驿程 [C].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

Two Roads for Transforming Peasant Culture by Zhongjingwen and Pengpai

DONG Xiao-ping

(Chinese Department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Zhongjingwen and Pengpai are good friends. Pengpai is a typical peasant socialist revolutionist, however, Zhongjingwen is a typical scholar who enters into the spirit world of peasants, and it is the first time for him to establish folklore system and its educational model, all of this are contribute to become the stable cornerstone of new culture construction. Viewing from the practice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transform, both of them are indispensable, so the work of studying their choice is very valuable.

[Key words] Zhongjingwen; Pengpai; peasant; folklore

〔责任编辑 娜木罕〕